

韓文公的郡望與籍貫

羅聯添

唐人多重郡望，不注重籍貫，因此自稱或稱人，都稱郡望。如杜甫籍貫是河南鞏縣，但杜甫在詩中每自稱杜陵人（杜陵在京兆萬年縣東南二十里，漢室帝陵所在）、祭外祖母文自稱京兆杜甫，因他的遠祖杜預出自京兆杜陵，京兆爲其郡望。又

如白居易籍貫是渭南縣下邽人（今陝西渭南縣）但白居易自稱以及別人稱他都稱太原人，因太原是白氏的郡望，秦將白起死後，白起的兒子白仲封於太原。又如柳宗元的籍貫應該是長安，但他自稱及別人稱他都稱河東，或河東解人，河東是柳氏郡望。又如劉禹錫籍貫是洛陽，但他自稱中山人，旁人稱爲彭城劉禹錫。中山、彭城都是劉氏的郡望。又如韓愈

（或族望），可表示家世的不凡，旁人會對他另眼相看，更子弟、姪女婿李翹自稱隴西人，因他是東晉西涼王李暉之後（李暉是李廣十六世孫），但他的籍貫應該是汴州開封縣人。此一些郡望不顯著的，就攀援依附到另一支郡望，也就是越這些例子，不勝枚舉。唐人所以重視郡望，其原因之一：

〔別宗派：這是因爲大姓人口繁多，遷居各地，年代久

遠，宗支世系不容易分清，舉郡望可以把各宗支系屬統合起來，是別宗派的一種簡易方法。例如李姓在唐代是大姓，各州各縣都有姓李的，爲了易於區別宗派，就舉其郡望（遠祖的居住地方），說李某是隴西人，李某是趙郡人，這樣把許許多多姓李的統合在兩大宗派之下，一是趙郡李，一是隴西李。（說本岑仲勉氏「唐集質疑」「韓愈河南河陽人」條參證）

—

又元和姓纂：陳留：本潁川人。後徙陳留。唐禮部郎中韓雲卿。弟紳卿，京兆司錄。兄子會、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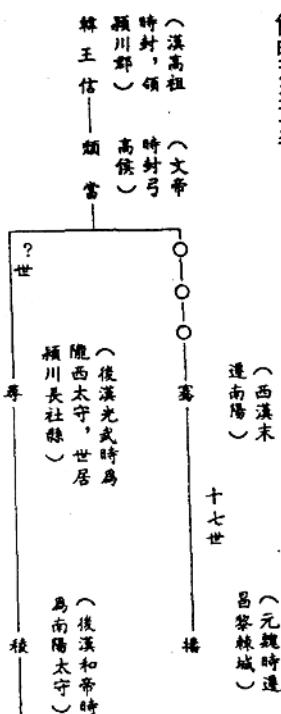
明瞭了店人重視郡望，自稱、稱人都稱郡望，因此可知
韓愈在詩文中自稱昌黎，李翊韓愈行狀稱「昌黎某人」，是
指韓氏的郡望，不是指籍貫。（舊唐書韓愈傳據此稱昌黎人，是把
郡望誤認是籍貫，舊唐書作者大多都把郡望誤認爲籍貫）另外李
白所作韓仲卿去思頌碑稱仲卿爲「南陽人」，仲卿是韓愈的
父親，這裏南陽指的也是韓氏郡望。宋洪興祖韓愈年譜，據
此認爲是南陽人，新唐書韓愈傳也以爲是南陽人，但加上鄧
州二字，也都是把郡望錯認爲籍貫。

昌黎、南陽既非韓愈的籍貫，仔細推考，也非韓愈這一系郡望。朱子校昌黎集傳說：

元和姓纂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。其一漢官高厚者，嘗至孫徽，避亂居南陽郡之諸陽。九世孫河東太守衛生，河東太守純，純四世孫安之，晉員外郎。二子濬、恬。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玄菟太守。二子都、偃。偃生後

魏中郎穎，穎生播（篤十七世孫），徙昌黎棘城。其一則
頴當裔孫導，為後漢隴西太守，世居穎川。生司空被。
後徙安定武安，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者，徙居九
門。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，茂生均，均生暖
暖生仁泰，仁泰生叡素，叡素生仲卿，仲卿生會、愈。
而中間當徙陳留，以此而推，則公固穎川之族，尋、被
之後，而不得承焉之矣。

漢高祖定天下，封韓襄王孫韓信爲韓王，統治穎川郡。設治於陽翟（晉移許昌，唐爲許州，今河南禹縣）。韓頽當是韓王信的兒子，漢文帝封爲弓高侯。他的裔孫分爲二支：一支是韓騫（頽當玄孫），王莽時避亂遷居南陽郡堵陽縣，到後魏時韓騫十七世裔孫韓播遷到昌黎郡棘城（約在今河北盧龍縣附近）。另外一支是韓尋（頽當裔孫，不知爲幾世）。後漢光武帝建武年間（西元二五—五七）爲隴西太守，世居於穎川郡。韓尋兒子韓稜，漢和帝曾任南陽太守。韓稜後裔遷居安平郡之九門縣（常山唐屬冀州，在河北）。韓稜兒子韓茂即韓愈六世祖，後魏封爲安定桓王。韓茂生均，均生峻，峻生仁泰，仁泰生叡素，叡素生仲卿，仲卿生會、介、愈等。爲了簡明列表如下。



相都出昌黎這一系。即：

(1) 韓思復，開元時爲黃門侍郎。

(2) 韓休，字良士，相玄宗。

(3) 韓休子滉，字太冲，相德宗。



由於昌黎一支在唐代人多勢盛，政治地位高，韓愈因而攀援越認昌黎作他的郡望，這種現象在唐代相當普遍。例如睿宗（李旦）宰相張說，是洛陽人，郡望河東而越認范陽。王維弟一代宗相王縉，籍貫蒲州（即河東），郡望太原，但越認郡望是琅琊。（見本仲勉貞石證史，集刊八本第四分），甚至李唐皇室也要越認郡望，據陳寅恪「李唐氏族之推測」一文的考證，李唐本來出於趙郡，但越認是隴西李暉涼武昭王的後嗣。皇帝、宰相猶不能免俗，何況其他？所以韓愈越認昌黎作郡望，不足爲怪，正所謂「門閥之見，賢哲不免」。

二

從上表看，可知韓愈是屬於潁川韓尋、韓稜這一支，與南陽

韓審、昌黎韓播這一支無關。舉郡望，應該舉潁川，或舉新郡望，安定、陳留、常山。昌黎、南陽既非韓愈這一支郡望，何以他自稱昌黎人，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說：是時昌黎之族頗盛，故隨稱之，亦若所謂言劉志出彭城，言李志出隴西者耶！

由於歷來郡望與籍貫混淆不清，以及由於韓愈在中國文學史上名位的崇隆，各府縣方志作者只要能牽上一點關係的，都要爭取，拉他作同鄉，因此使得韓愈籍貫的記載非常分歧，就筆者所知至少有八種不同的說法。

(一) 昌黎（舊唐書韓愈傳）

(二) 南陽（洪興祖韓譜）

(三) 鄭州南陽（新唐書韓愈傳）

四河內修武（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，近人錢基博韓愈志亦主此說）

朱子認爲昌黎這一支在唐代人丁旺盛，韓愈因此攀援依附，隨稱昌黎。我們只要查考新唐書宰相表及元和姓纂，可知朱子的話是有根據的。除此之外，韓愈越認昌黎，正是所謂「門閥之見」。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，盛唐、中唐有三個宰

(四)河內南陽（朱子校昌黎集傳引方苞韓詩增考）

(五)河中永樂（見朱子校昌黎集傳引）

(六)河南沁陽（梁容若文學十家傳韓愈評傳）

(八)河南河陽（岑仲勉唐集質疑史語所集刊第九本）

(四)、(五)兩說，發前人所未發，因為不知何所據（梁說或據縣志）

暫時置之不論。第(一)、(二)說都錯認郡望為籍貫，前面已提過。

第(二)說除了錯認郡望為籍貫外，又加上唐代州稱，可謂錯上

加錯。至於第四、(五)說法的錯誤，是由於漢書地理志有兩個南陽：

一為河內修武，即春秋晉國所開闢的南陽（左傳廿五年·晉子是

始作南陽）。二為南陽堵陽，即韓愈所遷居的地方。朱子把

李白仲卿碑所說南陽郡，米充當春秋晉國所開闢的南陽，而

不知春秋晉國開闢的南陽是古代一個地域名稱，與郡望無關。

方松卿據韓愈女墓墳銘，「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」，認

為河陽是韓愈居住的地方，固然對，但又以為河陽自漢至隋

屬於河內郡，在春秋為南陽地域。這南陽也就是李白所說

的南陽，所以河內河陽等於河內南陽，因以為韓愈是河內南

陽人。他把古地南陽來充當李所說的漢郡南陽，其誤跟朱子

一樣。又河內是郡，南陽也是郡，兩郡疊稱，跟新唐書韓愈

傳一樣的錯上加錯。

最後談到韓愈的籍貫，今人岑仲勉先生在他的「唐集質疑」一文中，有「韓愈河南河陽人」一條，認為韓愈的籍貫應該是河南河陽縣。

孟縣志云：「右韓愈自為墓誌銘……按縣情略云，誌石於前明萬曆年間（一五七三—一六二〇）自孟縣北二十里

蘇村，即古尹村韓王墓前出土，當時韓文公裔孫得之，藏於家。……後人作修武志者皆載韓文公為修武人。與

作昌黎縣志者據舊書載公為昌黎人，其說皆堅持不下，與

而不意千載之下，此誌迺出於孟縣尹村韓氏祖塋之前，

因此知韓公所謂「往河陽省墳墓」（祭十二郎文）者確

在此地，而公之為唐河陽人，今孟縣地，灼然無疑。」

據石刻以定愈之里居，可使爭議者無置喙餘地。……全

文六八七皇甫湜所為愈墓誌曰：「三月癸酉（二十九日），

葬河南河陽」，愈貢河南河陽，初不待祀誌之出而後明。

又昌黎集二八息國夫人墓誌云，「葬河南河陽……將葬，

李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」，葬河陽而與愈為鄰，

愈為河陽人已一語道破，無事探求。……（集刊九本）

岑仲勉確定韓愈為河陽人，依據有三點。（一）據孟縣志所載明

萬曆年間（十六世紀末，十七世紀初）在孟縣北邊二十里蘇村出

土的韓昶（韓愈兒子）自作墓誌銘。（二）據皇甫湜所作韓愈墓

誌，韓愈死後第二年是葬在河陽。（三）據韓愈所作息國夫人墓

李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」，葬河陽而與愈為鄰，

愈為河陽人。李戡、李成請他們鄰居韓愈為母親作墓誌，可證韓愈

也是河陽人。下面補充一些岑仲勉所沒有提到的資料。

（一）昌黎集二三祭十二郎文：「中年兄歿南方，吾與汝俱

幼，從嫂歸葬河陽。」知韓愈兄韓會是葬在河陽。

（二）昌黎集三五女墓墳銘：「歸女墓之骨于河南之河陽葬

之。」知韓愈女韓翠是葬於河陽。

（三）張司業集七祭退之詩：「舊塋盟津北，野空動鐵鉦。」

荀至指先世墳墓。盟津即河陽，據此知韓愈是葬在河陽北邊韓氏先世墳墓附近。這跟韓祀墓誌出土地方立置相合。

此外今人韓思道先生（自云韓愈廿九世孫）「韓昌黎先生里籍考」（再生雜誌三卷五期，民國六十二年五月）有一段話說：

河陽就是現今河南省孟縣。……現在孟縣的西尹村，有公七世祖魏安定桓王韓茂之墓，有公胞兄韓會夫婦之墓，縣西韓家莊有公父親韓仲卿墓，叔父雲卿之墓，及公本人的墳墓，縣東摘星廟下復有公姪韓湘之墓，鐵證猶在，如言公之籍貫或鄧州南陽，實為無稽之談。

據張籍祭退之詩，韓愈墓當孟縣北邊，跟這裏說的不合，又不認本宗而推望姓，誠然是捨近求遠喪失尊敬本宗的心意。唐人推崔盧等姓為甲族，雖子孫貧賤皆家世所重。今人不復以氏族為事，王公之女，苟貧乏，有盛年而不能嫁者，閭閻富室，便可以婚侯門，婿甲科。

尹村當在縣北，與西尹村亦不合。然韓思道先生既為韓愈嫡系子孫，所言韓愈家族墳墓在河陽，必有所據，韓愈籍貫河陽，自無可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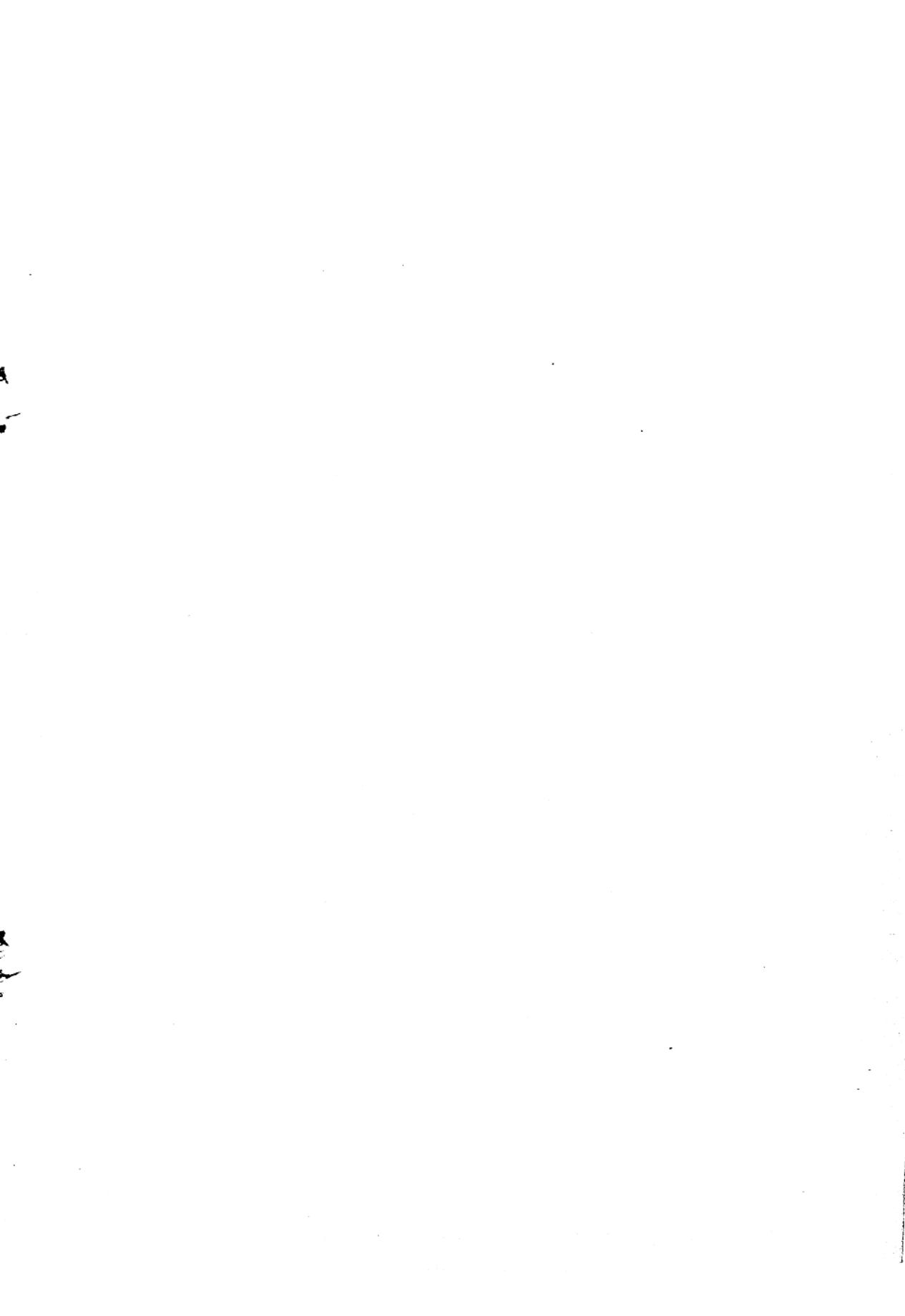
四

總而言之，韓愈系出潁川（治今河南禹縣），籍貫河南河陽縣（今河南孟縣）。昌黎、南陽是韓氏另一支郡望，跟韓愈籍貫和他的本支郡望不相干。

唐人尚氏族，推姓顯於一郡者，謂之望姓，如清河張、天水趙之類。世人惑於流俗，不究本宗源流，執唐所推望姓，認為己之所自出，謁刺之屬顯然書之。至於封爵，亦復如是，殊失尊祖敬宗之意。

吉州廬陵縣（今江西廬陵縣治），稱廬陵人。王安石籍屬臨川（今江西臨川縣治），稱臨川人。三蘇出自眉州眉山縣（今四川眉山縣治），稱眉山人。自稱或稱人都不稱郡望了。

附記：本文是就拙著「韓愈研究」中「郡望與里居」一節，予以補充修訂而成。



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公

駱志伊

「匹夫而爲百世師，一言而爲天下法？……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，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奪三軍之帥。」——這是大文豪蘇東坡讚美韓愈的話。

韓愈字退之。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（西元七八六年），卒於唐穆宗長慶四年（西元八四三年）享年五十七歲。追贈禮部尚書（贈三品），謚法「文」，世稱韓文公。他雖然生於長安，亦死於長安，但原籍是鄧州南陽（今河南省南陽縣）。先世是昌黎人，所以也自稱「昌黎韓愈」。

韓愈的家世，歷代都做官。他的父親韓仲卿做過武昌縣令，也很會寫文章，頗有名聲。韓愈的長兄韓會，二兄韓介，在當時都做過官。韓愈排行第三，他三歲時，父母相繼逝世，即寄養於長兄韓會的家中。後來韓會被貶爲韶州刺史，韓愈便隨兄嫂遷到韶州居住。那時韓愈僅有十歲。

韓愈十五歲，大兄韓會逝於韶州刺史任內。二兄韓介也相繼謝世。韓愈孤苦流離，由他的大嫂鄭氏照顧和撫養。他的大嫂對待韓愈很好，照顧韓愈，像自己親生的兒子一般，常常教導他，鼓勵他。韓愈從小心懷大志，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視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。」

韓愈逐漸長大，盡讀六經百家的書，也很會寫文章，很爲當時大文學家肅存所賞識。十九歲赴京參加考試，又得到當時的古文家梁肅的稱許；並得到梁肅的荐舉，做了「都士」。曾三次參加「博學宏詞」考試皆不得志。後來在德宗時，登進士第。所謂：「四舉於禮部乃一得，三試於吏部卒無成。」

韓愈一生從政，宦海浮沉，由觀察推官做到長慶三年的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（從三品），後改任吏部侍郎（正四品），官運到此，已是接近尾聲了。他做官時，不避權貴，對於不合理的事情，決不作半步的退讓。當

時的人都稱他為「鐵心男兒」。唐朝德宗皇帝，也知道

，也非常欽佩。

有一次德宗皇帝想要廢掉太子，但對這問題，猶豫不決。韓愈知道了，便立即上書勸諫，力舉太子無可廢的理由，舌戰群奸，德宗終於醒悟，而放棄了廢太子的主張。因此，韓愈開罪了許多朝廷重臣，他們聯合向德宗進讒言，說韓愈有心離間，國謀不軌，巴結太子，相機行事。德宗聽了，十分憤怒，不分青紅皂白，便將韓愈貶職，並決定廢掉太子。後來，正要採取行動的時候

，發覺自己受了權貴的欺騙，又連忙下旨恢復韓愈的官職，而且還對他特別的信任和重用。

不久，德宗崩逝，太子憲宗即位，對於韓愈過去曾竭力護衛自己，萬分感激。韓愈也盡力理好政事，希望憲宗能夠成為一個聰明的君主。但憲宗是一個多疑善忌的人，加以權貴的慫恿，結果就將韓愈貶到荒僻的潮州去。

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陽路八千；欲爲聖朝除弊

，肯將衰朽惜殘年。
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；知汝遠來應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邊。
這首詩就是韓愈諫迎佛骨，貶官潮州，路遇姪孫韓

湘，寄託他心中的感慨而作。

韓愈貶到潮州的經緯是如此的：緣韓愈以亞聖孟子自況，自認為儒學道統的繼承人，主張恢復儒家的仁義道德，極力反對道教，佛教的虛無觀念。他認為佛教在當時建立的寺院，大量佔去土地，僧侶過着奢侈的生活，實在造成人民的沉重負荷。

當時，有一個圓翔法門寺，有護國真身塔，塔內存放釋迦牟尼佛的手指骨一節。憲宗皇帝十分信仰佛教，曾命杜英奇，率領宮人三十名，攜帶香燭禮品，前往臨臯迎接佛骨。這個儀節非常隆重，長安到處大肆鋪張，不少人民受迷惑影響，放下正業，求燒頭頂灼臂，皈依佛法，弄到民間產業破產，苦不堪言。

韓愈目睹當時的情景，内心非常反對，於是上奏疏給皇帝，請求停止迎接佛骨。

憲宗一看韓愈反對的奏疏，異常震怒，翌日，將韓愈的奏疏遞給宰相和諸大臣傳閱，並下令要將韓愈處以極刑。幸虧裴度、崔羣二大臣極力說情，方改貶官為潮州刺史。

當時許多朝中大官如遭貶為州縣地方小官，往往消極抵抗，不理政事，但韓愈到任伊始，立刻深入了解民間疾苦。恰巧，潮州水上有鱠魚，時常吞噬民間畜類，韓愈目睹此情後，寫了一篇「祭鱠魚文」，他說：「謹

魚有知，其聽刺史言：潮之州，大海在其南，鯨鰐之大，蠻蠻之細，無不容歸，以生以食，鱸魚潮發而夕至也。盡三日，其率醜類南徙於海，以避天子之命吏。三日不能至五日，五日不能至七日，七日不能，是終不肯徙也。……刺使則選材技吏民，操強弓毒矢，以與鱸魚從事，必盡殺乃止，其無悔！」

據傳說韓愈將「祭鱸魚文」投入水中後，舉風雷電起溪中，數日水盡涸，鱸魚西徙六十里。自此，潮州無鱸魚之患。這個傳說雖然不一定可靠，此篇「祭鱸魚文」，也不一定真有驅逐鱸魚的力量，但是韓愈關心疾苦到無微不至，由此可見，當地人民由於對韓愈的感激，曾經流行一種風俗，凡是婦女外出，必用布帕丈餘，放在頭上，兩邊垂至足膝，名為「文公帕」，用示不忘韓愈的恩惠。

韓文中，價值最高的是雜文。他的雜文，對當時的政治，作了極大膽的諷刺。短小精悍，成就很大。

韓愈的政論，尤其有名。如「原道」，「原毀」，「爭臣論」，「諫迎佛骨表」等。或說理，或議論，都富有人情，語言生動，條理井然，說服力很強硬。

韓愈的序文和祭文，都是很出色的文學作品。「送李壁歸盤谷序」，是唐德宗貞元十七年（西元八〇一）在長安送李履回盤谷，臨別時寫的。蘇東坡說：「唐無

文章，唯昌黎送李履歸盤谷序而已。」足徵前人對此篇文章的重視。「送孟東野序」，是借他人酒杯，澆自己塊壘。「祭十二郎文」，反覆描寫對亡姪的悲痛，曲折真摯，迴腸蕩胸，為祭文中千古絕調。

韓詩氣魄浩大，內容豐富，他所寫的「赴江陵途中寄贈王李等三學士」，「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」，「謁衡陽廟還宿岳寺題門樓」等，堪稱傑作。

有人批評韓愈熱衷於作官，並舉他的「上宰相書」和寄給當時權貴的許多信札為例，認為有失身份，此一批評，初看似有見地。但我們須知唐代以詩文取士，衡量詩文的標準，極不一致。而當時名公巨卿多負文名，他們同時即為文壇評論的權威。一個讀書人希冀成名，必須有人替他推薦。因此，在未登第見用時，寫信給大人物呈獻自己的作品，為當時一種風氣。例如李白以謠仙之才，尚且寫信給韓荊州，其他的人更可想而知。我們今天細讀韓愈這類書信，紙覺得在迫切的情詞中，包含着許多眼淚和辛酸，他全無虛偽掩飾，寫出由衷的呼籲，刻劃內心的愛喜，也正是他真摯坦白處。其次韓愈三歲而孤，賴兄嫂撫養，艱苦窮困，至於成年。當時一個讀書人，不求功名便無以為生。「仕非為貧也，而有時乎為貧」；他自然志切進取，不甘自棄自棄。再言之，韓愈所受的影響，完全是儒家的「學而優則仕」的正

他反對佛家道家的思想生活。提倡忠孝節義。

韓愈對於家人是有極深厚的感情。祇要一讀他的「祭十二郎文」，便覺得字字都從肺腑中流出，使我們的心深深沈浸在悲哀中，跟着他一齊痛徹心肺。

韓愈對於朝廷是發於忠義之至性的。本傳稱他服官「操行堅正，鍛言無所忌。」雖屢遭貶黜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他爲破除憲宗迷信，諫迎佛骨，力陳其非，爲此幾乎斷送了性命。

韓愈和孟東野、柳宗元，都有極不尋常之友誼。東野，宗元，皆爲當代名家。若依「文人相輕」之說，韓愈縱然不譖罵他們，至少也不肯推許他們。然而，事實並非如此。紙要一讀他的「與孟東野書」和「柳子厚墓誌銘」便知他們彼此之間的生死交情是何等的深厚！

總之，韓愈是唐宋古文運動的領導者。他的「進學解」一文，吾人應目之爲古文復興運動的宣言，對於當時根深蒂固的駢文陣線發出正式宣戰的訊號。簡直是異軍突起，石破天驚！

韓愈也是文學創作的重要實行者，更是我國文學史上很出色的散文家。所謂古文運動，就是反對六朝以來的駢體唯美文體，而恢復到周秦兩漢的質樸古文。他主張「文以載道」。所謂「道」，就是周公、孔子所傳下的治國平天下之道，亦即儒家所常講的仁義倫常之道。

由韓愈感春詩評驚韓愈人格 型態的發展歷程 段醒民

目次

前言

- 壹、前期四首隱含的人格型態評論
- 一、寫作的年代
- 二、本期詩作與人格形成的背景
- 三、感春四首析評
- 四、本期詩作所反映的人格特質
- 貳、中期五首隱含的人格型態評論

段醒民先生，民國五十八年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。
曾任講師、副教授多年，現為本校專任教授。
先後撰有韓愈詩用韻考、柳子厚家世考述、柳子厚寓言文學探微等學術論著三十餘萬言。
本文係作者運用現代心理學評析先賢作品中所含蘊之人格型態，頗具新意，爰特刊出，
以饗讀者。

- 一、寫作的年代
- 二、本期詩作與人格形成的背景
- 三、感春五首析評
- 四、本期詩作所反映的人格特質
- 參、後期三首隱含的人格型態評論
- 一、作詩年代辨誤
- 二、寫作年代與背景新考
- 三、感春三首析評
- 四、本期詩作所反映的人格特質
- 肆、結論
- 一、感春三期對理
- 二、論韓愈人格型態的發展歷程
- 附註
- 附錄：引用參考書目

前言

感春詩，雖非韓退之有心求勝的巨構，而且亦非後世膾炙人口的詩篇；但它卻是退之真實情懷的自然發露，亦是吾人藉以評論退之人格型態的最佳憑證！

退之所作的詩，據原始編輯人李漢統計：共有古、律三百七十首^①。後人對這些詩作的評價亦是毀譽參半——有人以為「其詩亦卓絕千古」「足與李杜鼎立」^②；但亦有論者譏其「以文爲詩」^③「適可爲酒令而已」^④！不過，平心而論：退之受譏評的詩，往往都是用力最多，有心逞巧而以奇險求勝的那一類；但另有一部分「文從字順，自然雄厚博大，不可捉摸」的「無心」之作^⑤，則是值得推崇的。至於感春詩，它既無「險韻奇字」，亦無「古句方言」^⑥，而祇是退之在心理極度不安不滿於現實生活，但又無力變革的情況下，眼見花開花謝，春光易逝的景象而興起了無限的人生感慨，確確實實是他「心情與會」^⑦的抒發。然則吾人據此以辨明退之作詩時的背景——影響退之人格發展的重要因素——進而探索退之內心世界的真實情懷（亦即人格型態）不亦十分可靠嗎？

再進一步言，感春詩非但多達十二首，而且寫作時間亦可分為三期，若僅憑此一客觀事實，即不難理解感春詩所具有的特殊意義了。無論如何，同題詩一時既已寫作多首，理當可以盡情抒發了；爲何他日居然又舊題新作，必至三次而後已？……當然，要解答此一問題，首先必須閱讀退之每一期的作品，並確定其寫作的時間；然後探發其形成不同內涵的原委，以了解每期作品的寫作背景；進而實際析評退之的不同內涵，作一個深入的觀察；最後更予以整理歸納。如此，退之各期詩作之動機與目的既明，就可參伍比較三期感春詩的異同，從而掌握退之由於年齡、官職、居地、際遇……等不同因素所形成的 different感受了。相信經由上述程序，不但可將退之感春詩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予以澄清；而且更重要、更具有研究價值的則是：退之的人格心理將因而一一明朗，吾人不正可據以評論韓愈人格型態的發展過程，從而對退之的人品修養有一正確而精細的認識嗎？

說到評論韓愈的論見，在現有資料中，本就是非紛紜、得失互見，大有難乎取捨之慨！事實上，他一生所努力的結果，在政治

上並沒有達成道行於時的願望；反而是文學上卓然自樹，成為趙宋以後千餘年的文壇宗師。但是，就因為退之在政治上的不如意，所以他不止一次的干求當道⑧，討好帝王⑨，甚至「有不堪之窮愁，形於文字」⑩；這種汲汲於功名的舉措，自不免有損於清譽了。可是，後世尊崇他的學者則又推美為「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奪三軍之帥」的「百世師」⑪；這種合道德、文章、事功於一身的成就，自當要受到聖人般的膜拜了。似此毀譽都有所據，吾人又將何以定其是非呢？

不過，筆者以為：要評論一位歷史人物，尤其是像韓愈這樣一位偉大而具影響力的文學家，在基本上就應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，作直接、廣泛、縝密、審慎的探討；退之是人，人就不免有優點、亦有缺憾；人就不免隨年齡、環境而改變其心性氣質；概括而論，吾人可說：某也賢、某也不肖，某也忠、某也姦；但如細加檢討，則賢者未必在一生中事事都有可采；而姦者亦未必一無可取！由此可見月旦人物之不易了；所幸退之自有文集傳世，得失是非之認定，人人可自其作品中發而抉之，原不待人云而後已亦云之了。但是客觀而周遍的準則卻是不容忽視的，論者既不可以個人好惡而評其是非，亦不可以一時而定一生得失！吾人如有此種認知，則何愁退之的音容笑貌、人格心態、德業勤勞一一重見於今日，以啓來者呢？於是筆者乃本乎此一準則，將退之感春詩標舉而出，假借今世心理學者的研究方式，用以探測感春各期詩作之際的人格型態並予比較，期能對論衡韓愈的治學者有所裨補！

最後，筆者尚須附帶說明的是：退之是歷史上的名家，後世習古文者的圭臬，有關介紹、論述他生平、文章、德業的文字著作太多，為省費重，並免於抄書之譏，如非絕對必要，本文未加徵引；至於心理學上的理論與術語，為免流於偏枯晦澀，本文亦甚少引用（讀者如欲作進一步瞭解，請檢閱李序僧先生所著「人格心理學」；或張春興、楊國樞兩位先生合著的「心理學」。）不過，本文這種根據現代心理學多元理論用以探索前賢詩作的方法，實是筆者一項大膽的嘗試，唯限於學識能力，謬誤疏陋處，在所難免；倘蒙高明方家的垂教，自當改而正之，感忭於無盡的。

壹、前期四首隱含的人格型態評隲

我所思兮在何所？情多地遐兮偏處處。東西南北皆欲往，千江隔兮萬山阻。
春風吹園雜花開，朝日照屋百鳥語。三不取醉不復論，一生長恨奈何許！（其一）

皇天平分成四時，春氣漫濃最可悲。雜花在林草蓋地，白日座上傾天維。

蜂喧鳥咽留不住，紅萼萬片從風吹。豈如秋霜雖慘冽，摧落老物誰惜之。

爲此徑須沽酒飲，自外天地棄不疑。近憐李杜無檢束，爛漫長醉多文辭。

屈原離騷二十五，不肯哺啜糟與醨。惜哉此子巧言語。不到聖處寧非癡。

辛逢堯舜明四目，條理品彙皆得宜。平明出門暮歸舍，酩酊馬上知爲誰。（其二）

朝騎一馬出，暝就一牀臥。詩書漸欲拋，節行久已惰。

冠欹髮禿，語誤悲齒墮，孤負平生心，已矣知奈何！（其三）

我恨不如江頭人，長網橫江遮紫鱗。獨宿荒陂射鳬鴈，賣納租賦官不嗔。
歸來歡笑對妻子，衣食自給寧羞貧。今者無端讀書史，智慧只足勞精神。

蠭蛇著足無處用，兩鬢雪白趨埃塵。乾愁漫解坐自累，與衆異趣誰相親？

敗盃燒腸雖暫醉，皎皎萬慮醒還新。百年未滿不得死，且可勤買拋青春。（其四）

——韓昌黎全集（以下省稱廖本）卷三——

一、寫作的年代

本期感春四首的寫作年代，在原詩之中並未確切透露消息，因此吾人自須先就前輩注家的意見加以觀察，然後再行判定。

子、魏懷忠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（以下簡稱魏本）引韓醇曰：元和元年春，據江陵時作。

丑、魏本又引唐庚曰：詩有云「千江隔兮萬山阻」、又云「我恨不如江頭人」、又云「兩鬢雪白趨埃塵」，此在江陵爲據曹審矣！寅、王元啓讀韓記疑曰：玩第二首「幸逢堯舜明四目」及「平明出門暮歸舍」句，似二年春爲國子博士在京師所作。蓋公旣遭飛語，方求分司東出，故其辭多哀怨之音。臨邛韓氏感於前後篇題，概指爲據江陵時作，非是。

卯、錢仲聯韓昌黎詩聚年集釋（以下簡稱錢氏聚年）曰：王說非是。「幸逢堯舜明四目」頌聖之語，何必定在京師？「平明出門暮歸舍」句，正與「兩鬢雪白趨埃塵」句合，是爲據江陵時情況，更不必指爲官博士時也。

上述四家說法，祇有王元啓對「元和元年春、據江陵時作」的判定表示懷疑，而錢仲聯氏則係針對王氏的疑惑加以澄清，簡明該要、深中肯綮，頗足採信！因此亦不煩多所辭贅，而可斷定本期感春四首是退之元和元年在江陵時的作品了。

二、本期詩作與人格形成的背景

「元和」是唐憲宗僅有的年號。元和元年，時當西元八〇六年，是憲宗即位的第二年^⑫。在這前一年，亦即順宗永貞元年的八月，由於順宗病重，傳位憲宗而自稱上皇，改貞元廿一年爲永貞元年。憲宗即位之初，就把順宗親信的大臣王伾、王叔文貶逐出去^⑬，受到株連的柳宗元、劉禹錫等「永貞黨人」稍後也都被放逐爲遠州的司馬。這是中唐史上有名的「八司馬」^⑭事件。此外，在憲宗即位後第八天^⑮西川節度使韋皋死了，而其部下支度副使劉闢，不遵朝廷法制，自立爲留後，實際控制西川的軍政大權。十月，朝廷派袁滋爲西川節度使，而任命劉闢回朝爲給事中，但劉闢不受徵，阻兵自守；袁滋畏其強，又不敢進。憲宗怒，貶袁滋爲吉州刺史，可是又無力征討劉闢，祇得在同年十二月任命劉闢爲西川節度副使，知節度事。憲宗雖然已在委屈求全，但劉闢卻是得寸進尺，求兼領三川不成，於是就在元和元年春正月興兵作亂了。劉闢是順宗時代王叔文所要正法的亂臣，由於韋執誼的怯弱，才有此時的大亂。在西川亂前數日，順宗上皇崩逝，祇活了四十六歲。

退之這年三十九歲，任職「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」。爲明退之此際人格形成暨本期感春四首的寫作背景，茲就有關問題考察如下：

一、居處環境對人格形成與詩作內容的影響
中唐江陵府，即今湖北省江陵縣，屬山南東道，在京師東南一千七百三十里^⑯，地當長江北岸。它在戰國時代，是楚國的都城，亦卽屈原賦「哀郢」的「郢都」。新唐書地理志云：

江陵府、江陵郡，本荊州南郡。天寶元年（西元七四二年）更郡名。肅宗上元元年（西元七六〇年），號「南都」，爲府。二年，罷郡。^⑰……土貢方：紋綾、貢布、柑橙、橘椑、白魚、糖蟹、梔子、貝母。^⑱……縣八。

同志在「縣八」之下，首列「江陵」，可證除「府」以外，還有「縣」的設置。其注曰：

貞元八年（西元七九二年），節度使嗣曹王臯^⑲塞古堤^⑳、廣良田五千頃、畝收一鍾；又規江南，廢洲爲廬舍，架江爲二橋。荆俗飲陂澤，乃教人鑿井，人以爲便。
總括而言：江陵是屈原當年的故都，臨長江、含荆山、盛產白魚、糖蟹、貝母之類的水族，居民的生活頗爲安定，同時又有陂澤可供息止。那麼，本期詩作中的「千江隔兮萬山阻」（其一）、「屈原離騷二十五」（其二）、「我恨不如江頭人、長網橫江遮紫鱣獨宿荒陂射鳬鴈」（其四）等句不都和「江陵」發生了密切關聯嗎？

一次言「法曹參軍」對人格形成與詩作內容的影響

據新唐書卷四十九下百官志，外官所載，江陵府應有法曹參軍事二人，是府尹的屬官，正七品下^㉑；從事的工作是「鞠獄麗法，督盜賊，知贓賄沒入」。這種「法曹貧賤衆所易」^㉒的官位，自非在宦海中已掙扎十年之久的退之所心安意願的，因而，他在永貞元年八月，奉接這個任命時，憤懣的情緒立即反映在他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的詩中：

昨者州前槌大鼓，嗣皇繼聖登臺阜。赦書一日行萬里，罪從大辟皆除死。
遷者追回流者還，濛汜蕩垢朝清班。州家申名使家抑，坎軻祇得移荆蠻。